

● 民俗文化叢書

中國佛教

一、佛門中的國寶——佛圖澄

二、逍遙園里的譯經師——鳩摩羅什

三、虎溪畔的淨土白蓮——慧遠

四、神悟天挺的涅槃聖——竺道生

五、三諦圓融的智者——智顗

六、西天取經的文化使者——玄奘

七、運水搬柴的悟禪者——慧能

八、科學前沿的行者——一行

九、戴黃帽的喇嘛——宗喀巴

十、光映空門的孤星——弘一

■ 王仲堯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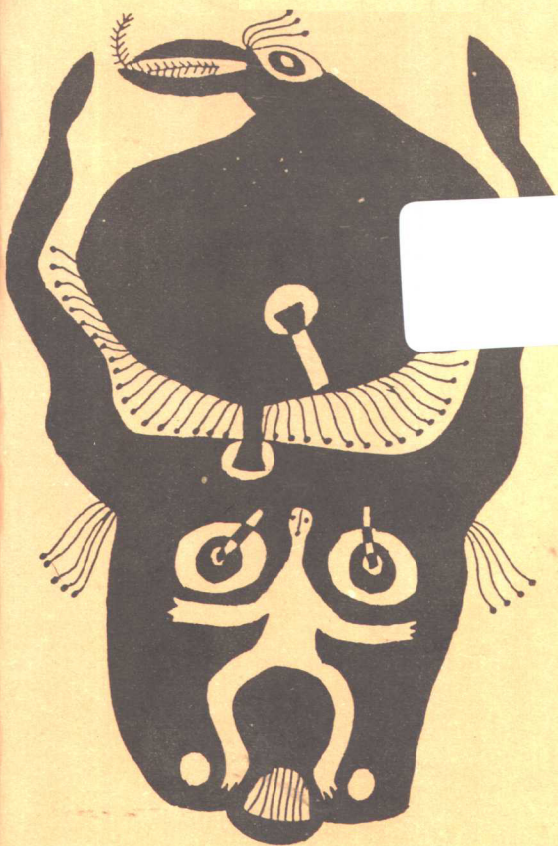
十大奇僧

中國佛教十大奇僧

王仲堯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▲ 民俗文化叢書



出版登记证号:(皖)01号

责任编辑:丁怀超

封面设计:丁明

内文插图:高琪

中国佛教十大奇僧

王仲尧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科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200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3201—23300

ISBN 7-212-00616-5/B·47 定价:4.00元

目 录

前 言	(1)
一、佛门中的国宝——佛图澄	(17)
二、逍遥园里的译经师——鸠摩罗什	(34)
三、虎溪畔的净土白莲——慧远	(62)
四、神悟天挺的涅槃圣——竺道生	(79)
五、三谛圆融的智者——智顗	(95)
六、西天取经的文化使者——玄奘	(115)
七、运水搬柴的悟禅者——慧能	(139)
八、科学前沿的密教行者——一行	(159)
九、戴黄帽的喇嘛——宗喀巴	(175)
十、光映空门的孤星——弘一	(196)
附录：主要参考资料	(216)
后 记	(219)

前 言

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系统中，中国佛学占有重要地位，这种由于佛教的传入，僧人的创造所形成的知识体系，构成了今人不能不予以重视的文化子系统，需要认真加以研究。

—

佛教初传中国的时间，有史可证的，是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（公元 58～75）年开始。此后，更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其他热心传教之人作用，使其渐布于中华，流入民间。但是，当时流行的教理行为，与中国黄老方技相通，因此仅被视为道术之一。如楚王刘英，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；又如恒帝刘志，“于官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”，都是因为好黄老之术，而兼及浮屠之教（即佛教）。当时中国士人，对于佛教尚无较深了解，所以依于神仙道术之言，并且，将僧人与方士，也视为一气。如汉末安世高（安清），为一代译经大师，但《高僧传》中，说他七曜五行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，无不综达，故俊异之声早被；而其精深佛学造诣，有时反被神迹异术之类掩盖。正因如此，对于佛教，当时“世人学子，多讥毁之”，“俊士之所规，儒林之所论，未闻修佛道以为贵，自损容以为上”。^①

① 牟子：《理惑论》。

直至魏晋以降,由于种种原因,玄学清谈之风渐盛,中华学术,面目为之一变;从此佛学仰依玄理,成一文化大观,并使高僧辈出,前后相望。

魏晋时期,玄学最关心的,是“本末有无”问题,而佛教般若学最注目的,是“空、有”问题,二者十分接近。东晋之初,中土般若学大盛,有所谓“六家七宗”,而讨论的问题,本质上仍与“本末有无”关联,其中所谓“本无义”,与王弼、何晏“贵无”学说继承;所谓“心无义”,与嵇康、阮籍“无心”思想连袂,所谓“即色义”,同郭象之辈“崇有”提法相因。名僧道安,在《毗奈耶序》中说,“于十二部,毗目罗部最多,以斯邦人老庄行教,与方等经兼忘相似,故因周易行。”可见他当时就已认识,佛教的流行,是靠了依附老庄思想。

于是,玄风笼罩下的佛教,得以在中国发展。而名僧立身行世风格,也与清谈者酷肖。名士释子,共汇一流,使佛教玄风,大振华夏。

当时名僧,不但与名士一样,具有神悟超绝,悬鉴过人的才华,而且往往也是一样的风流倜傥。如支孝龙,“少以风姿见重,加复形神卓犖”,高论机辩,无不适时,为名士推崇^①。据《晋书》等载,支孝龙与阮瞻、庾凯、胡毋辅之、王澄、光逸等名士为友,时人谓之“八达”。胡毋辅之等人,散发裸裎,闭室酣饮累日,光逸来,守门者不让进,光逸便于门外,脱衣露头,于狗窦之中,窥之大叫;遂入共饮,不舍昼夜。达者,心神悠然旨远,块然自足,不屑毁誉者也。有人对支孝龙身为沙门不解,支孝龙答曰:“抱一以逍遥,唯寂以致诚。彼谓我辱,我弃彼荣。故无心于贵而愈贵,无心于足而愈足矣。”时人谓之“真达”。名士孙绰赞支孝龙道,“小方易拟,大器难像。盘桓孝龙,克迈高广。物竞宗归,人思效仰。云泉弥漫,兰风膺响。”可谓推崇至极。名僧既为人推崇,佛教当然也就为人见重。

① 慧皎:《高僧传·支孝龙传》。

永嘉之后，玄风更炽，名俊辐凑，集于江南，争谈虚玄，竞论无为，以清言放达，互相高尚。释门之子，具清谈者风气，也更为显著。如名僧康僧渊，容止详正，志业弘深，既通晓佛经深远之理，又明辨俗书性情之义，与人清谈，自昼至暮，人不能屈^①。名僧康法畅，雅有才思，善为往复，悟锐有神，才辞通辩，每值名宾，往往清谈尽日^②。

僧人既具这等风趣品格，因此东晋时朝中豪杰，清流巨子，如石季伦（石崇）、谢安、王羲之等，皆多与往来。

《晋书》称，谢安未仕前，“寓居会稽。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。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”。又道，“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。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，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”支遁，即名僧支道林，他长得形貌丑异，而玄谈妙美，平生养马喂鹤，优游山水，又擅草隶，文翰冠世。当时风尚，最重《庄》、《老》，而道林谈《庄》，无论《渔父》，无论《逍遥》，皆能标揭新理，发人所未发，才藻俊拔，令人惊绝^③。僧人既能以自身文才修养和品格风度，领袖群伦，高标当世，则佛法流布，已无可抗拒。

自佛教传入中国，由汉至前魏，上流社会不闻有尊重僧人者，因此不重佛教，佛教亦因之不显。而西晋时，阮、庾、胡、王与支孝龙为友，东晋名士，则崇奉支道林等，因此佛教大为上流社会所重，神风清肃，日见兴隆。

士大夫欣赏佛学，帝王也与之同好。东晋元帝（司马睿）、明帝（司马昭）之世，都敬礼名士。二帝既敬礼名士，支道林等僧人，本是

① 二人事迹，俱见《高僧传》及《世说新语》所载。

② 同上。

③ 谢安、王羲之与支道林交游事迹，《晋书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高僧传》记载甚详，可参阅。

名士辈中俊秀，则帝王自难免受时尚影响。明帝甚至成为一位著名佛画家，名士刁凿齿《致道安书》中说：“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，始钦斯道。手画如来之容，口味三昧之旨。”这位明帝好尚佛法，已十分著称。帝王好佛，下必效之，可想而知。

由此可见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因某种历史机遇，与玄学依傍，促成了一代名僧。而正因有了这些名僧，才使玄妙之极的佛学，得以为社会接受，从而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展。因此，中国僧人——主要是指有杰出成就的名僧——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宗教家，而且还是“文化人”。正是其具有的文化人特质，才使得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，最终达到了僧佛的互相促成。

故而研究佛教，必须研究历代僧人。尤其对历代名僧的研究，更为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途。本书正是禀了这样的宗旨，而从事佛教僧人的研究；并希望通过这个研究，对中国佛教的文化特质，有所揭示。

二

慧皎在《高僧传·序》中，有一段名言：

“自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。然‘名’者，本实之宾也。若实行潜光，则高而不名。寡德适时，则名而不高。”

因此，慧皎将其撰命名为“高”僧传。汤用彤先生评曰：“盖名僧者和同风气，依傍时代以步趋，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。高僧者特立独行，释迦精神之所寄，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。至若高僧之特出者，则其德行其学识独步一世，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。然佛教史上不数见也。”^① 慧皎所谓“名僧”者，指一时和同风气，迎合潮流，甚至欺世盗名的僧人，一时出名，但未必真有德行、

① 汤用彤：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第133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有学识，所以常常“名而不高”。那些真正有德行、有学识之人，有时因超越时代，反而难为世人理解，默默无闻，并不出名，即所谓“高而不名”。

慧皎此论一出，天下首肯。此后千百年，凡有人作僧传，都称“高僧”传，不称“名僧”传，以示雅正。但实际上，慧皎本意，倒也并不在“名”、“高”概念本身之辨，而在力倡表彰真有德行之人，旌扬确具学识之僧。这样的僧人，如汤用彤先生所说，“佛教史上不数见”，人数不多；但必定“特立独行”，“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”。纵观中国佛教史，每当一个佛教兴盛光大时期来临，必定有一些这样的僧人，或推动发展，或创宗立派，不但使教法灿烂于当时，更使佛教文化流光于后世。

东晋十六国时，南北分裂，长年战乱，民不聊生。佛教的玄远境界、精致理论及其宗教神秘氛围，使人们都想从中寻找寄托，以排解现实之苦难。不但上层统治者支持提倡，下层群众也一样地需要向往。当时，南方是东晋王朝，北方则四分五裂，有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“五胡”等建立的二赵、三秦、四燕、五凉、夏、成（成汉）十六国。南北两地，多数统治者，尤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，为维护统治的需要，都大力提倡佛教，为佛教的发展，提供了肥沃土壤，使佛教获得蓬勃生机。其间名僧如星，或以异迹化人，或以神力拯物，或传经译典，或辨证哲理，含章秀发，群英间出，终于汇成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。此时的发展线索，以僧人活动事迹表达，主要有二：

① 佛图澄—道安—慧远

② 鸠摩罗什—僧肇、竺道生

第一条线索中，佛图澄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，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，他根据当时特定情况，用道术感化后赵统治者石勒、石虎，取得信任，在中国历史上，首次使佛教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。

道安是佛图澄著名弟子。佛图澄死后，道安成为北方佛教领袖。其一生活活动，主要是整理和阐述佛教经典，创立以“本无”为宗旨的佛学理论，同时建立僧团，宣传法教，培养门人。一度还做过前秦统治者苻坚的政治顾问。道安在当时影响很大，从弘化佛学、培育人才、主持译经、整顿戒律几个方面，他都称得上是一位大师。

慧远是道安门下最杰出的弟子。他曾追随道安 25 年，以后到庐山主持东林寺达 30 余年，使庐山成为南方东晋的两个佛教中心之一（另一中心是京城建康的道场寺）。他聚众讲学，撰写著作，阐发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，还率领名士刘遗民等 123 人，在无量寿佛前，共期往生西方净土，被后世推为影响甚大的中国佛教净土宗之初始。他还与鸠摩罗什、佛驮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互相交流学术，推动了佛教在南方的广泛流传。慧远也培养出一大批弟子。他本身则既是僧人，又是一个大名士，学问人格俱优，赢得东晋朝上至帝王贵胄，下至学人释子一致尊崇。

第二条线索中，鸠摩罗什足可称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奇人。他是今新疆库车（古龟兹国）人，年轻时在西域弘法传教，即已声誉煊赫。道安曾一再劝前秦苻坚迎请罗什，苻坚果真遣大将吕光率军攻下龟兹，去迎请罗什。不巧吕光回凉州时，苻坚已经因遭淝水之败后亡国。以后，后秦统治者姚兴又出兵凉州，灭后凉国，迎罗什到长安。姚兴对罗什备极恭敬，奉为国师，并由国家出资，组织译场，由罗什主持译经。

据《开元录》载，从汉至西晋，250 年间，共译佛经 1420 卷。而这一时期（包括东晋、后秦等），约 100 年间，却译经 1716 卷，其中，特别是罗什之译，一改以往朴拙古风，使译文准确达意，臻于成熟。罗什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般若空宗学说，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罗什本人才华横溢，门下弟子，也多俊杰。

僧肇是罗什弟子中一位著名年轻才子。他出身贫寒，少时以代人抄书糊口，因书抄得多，在抄书的同时得以免费阅读了大量经史

典籍，打下深厚学问功底。后读到《维摩经》，披寻玩味，不禁欢喜顶受，觉得比《老》、《庄》更尽善尽美，足以为人生归宿，于是出家。不久精通佛学，名振一时，长安宿儒，关外英彦，俱为他学识折服。投到罗什门下后，他写出一系列在中国佛教史，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论文，思想深邃，文辞优美，对于般若空宗学说的理解阐发，已入化境，被誉为中土“解空第一”。僧肇融会中外思想，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创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，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可惜他英年早逝^①。

竺道生是罗什门下另一位杰出英才。他神悟超群，思辩出众，尤其对涅槃佛性学，深有心得，敢于对前人之说，大胆怀疑，提出“一阐提人皆有佛性”思想，又提出较彻底的顿悟成佛学说；孤明先发，独见杵众，被旧学僧党，摈而遣之。以后，有更完整的佛经译本出现，经文之中，与道生之言，多有一致，于是京城僧众，大为惭愧，追而信服，使道生身后，从者如风。道生因此被称为“涅槃圣”，其学说被衍为佛界统治思想。竺道生使中国佛性思想，乃至中国佛学整个地改变了方向，因此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。

东晋十六国之后，是又持续分立达 160 多年之久的南北朝。这期间，佛教进一步发展。到隋唐之际，佛教经过在中国 4~5 个世纪的流传之后，进入宗派形成和发展的成熟时期。南北政治统一，国家经济繁荣，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。佛教也随着求同求通的历史趋势，综合南北各种思想体系，开花结果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。各种具有独特教义，独自教规，并有单独传法世系的宗派，使佛教的发展，汇成又一个更高浪峰。洪风既扇，大化斯融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写下划时代的一章。此时发展线索，以僧人活动事迹表达，主要有以下诸人：

智顗 吉藏 玄奘 法藏 善无畏 金刚智 一

① 僧肇 31 岁死。死前在《答刘遗民》中道：“贫道劳疾每不佳”。

行 慧能 道宣 善导等

他们各领风骚，皆一时人杰。

智顗在隋代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佛教宗派——天台宗。他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，不但是杰出的佛教理论家，同时也是极为成功的社会活动家；既富有组织才能，又善于宣传鼓动，还擅长经济经营。天台宗创宗之后，国内外影响极大。后因唯识宗、华严宗崛起，有黯然不彰之势。此后，至九祖湛然，倡“无情有性”理论，又使此宗一度中兴。

吉藏是三论宗创始人，创宗亦在隋代。此宗因以印度中观学派的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为主要典据而得名，实际上此宗可看作印度中观系统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一个流派，是龙树、提婆学说的主要继承者。但在结合中国文化进行创新方面成就不大，因此流行不久，当天台、唯识宗相继盛行，此宗便趋衰颓。

玄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奇人，是法相唯识宗创始人。他学问功底极其深湛。为使中国佛教理论完善，只身去印度取经。他的学问人格，在异邦赢得空前声誉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贡献。回国后，他在唐太宗李世民直接支持下，又主持译出大量佛教典籍，在中国翻译史上，继鸠摩罗什之后，又开辟一新纪元。

法藏是华严宗创始人。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与武则天等有密切关系。他活动能力极强，先后做过武则天、唐中宗、睿宗等帝王之师，人称“五帝门师”。他创立的华严宗，与智顗创立的天台宗、慧能创立的禅宗，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宗派。

善无畏、金刚智和一行，都是中国佛教密宗创始人，其中一行又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，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。密宗仪轨极为复杂，需经导师（阿闍梨）秘密传授方可得法，具有极浓厚的神秘色彩。但密宗在汉族地区流传不是很广。

慧能是禅宗实际创始人。禅宗主张“教外别传”，不立文字，不

重禅定，强调顿悟。它不仅和以往流传过的各种禅学、禅修、禅定不同，而且和印度佛教以及中国佛教的其他学派，都大相径庭，完全可以看作是世界佛教史上、尤其中国佛教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变革。由于禅宗这种鼎新精神，因此在中国，尤其在民间广泛流传，渐成中唐之后佛教主流。慧能本人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奇迹。他以自己整个的人生塑造的那种“禅”的意境，迄今仍是人类文化中最神奇、最迷人的部分之一。

道宣是律宗创始人之一。唐代国家统一，佛教内部，适应时代，也需要有统一的戒律以加强组织，律宗因运而生。道宣还是卓有成就的佛教史家，所作《续高僧传》，不但在佛教研究，而且在中国史学研究中，都颇有价值。

善导是净土宗创始人。净土宗不强调通达佛经，也不教人研究教法，甚至不需要人静坐专修；只要信愿具足，一心念佛，就可望进入西天极乐净土。由于净土宗理论极简，不象其他佛教宗派那样，往往有比较深奥的唯心理论，因此更适合在民众中传播，因此流行极为普遍。直至今日，民间信佛者仍多为净土宗。

天台、三论、唯识、华严、密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净土，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八大宗派。它们全部在隋唐时创立，使中国佛教的发展，达到全盛时间，并万象纷呈地走向世界。

唐末五代以后，佛教由高峰向下跌落。

两宋320年间，基本上对佛教实行保护和限制并重方针。元代对西藏佛教（喇嘛教）颇有扶持。明代共历276年，开国皇帝朱元璋原出身僧侣，颇知农民起义秘密利用宗教的情况，因此注意对佛教进行整顿，限制了佛教发展。清朝268年，其间主要也是继承明代佛教余绪。但明清以后，佛学与儒、道其实已经互相渗透。与此相关，明清开始，还出现了在家居士研究佛教的风气。

此外，中国佛教还有另一重要支脉，即藏传佛教，主要是从印度直接传入，并与西藏地区原有的宗教——本教，互相影响，也产

生了若干宗派，其共同特色，是显、密双修。在广阔的青藏高原之上，也有一些颇具文化人特色的僧人，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宗教文化业绩，如元代的八思巴、明初的宗喀巴等。

但是，一种文化，无论是具有宗教内核的，还是包含政治内容的，其能否立足，能否发扬光大，总是还须取决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。中国佛教文化虽以其强大的辐射力，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，但是在其末法时期，即使以李叔同（弘一）这样的大文化人，欲想挽狂澜于既倒，也是力不从心，只能徒叹奈何。

本书限于篇幅和体例，只写了以上僧人中的十个。其中东晋十六国时期四人：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慧远、竺道生；隋唐时期四人：智顗、玄奘、一行、慧能；藏传佛教一人：宗喀巴；近代一人：弘一。通过这十位著名高僧的事迹，读者或可一窥中国佛教之流变大略。

由于这十名僧人，其人生际遇与一般人（包括一般僧人）相比，颇具奇特之处，而对佛教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，又各有奇异光彩，因此名之曰“奇僧”。

三

回顾千多年前，信仰佛教的决不仅是如今春暖花开时期，我们在苏杭等地常可见到的那些身背黄布包，成群结队进庙烧香的老太太们。那时，上至帝王、后妃，贵族公卿，文人学士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布衣草民，全社会崇佛，有时几乎如醉如痴。北魏杨衒之，在《洛阳伽蓝记》中，记载京城佛诞日举行行像仪式的盛况道：

“于时，金华映日，宝盖浮云；幡幢若林，香烟似雾；梵乐法音，聒动天地；百戏腾骧，所在骈比；名僧德众，负锡为群；信徒法侣，持花成藪；车骑填咽，繁衍相倾。”

空前盛况，使西域沙门，见之惊叹中国已成佛国。

大概也是因为当时无电影电视等娱乐消遣手段，戏剧也不甚发达普遍，因此，每当寺院僧人举行讲经法会（俗讲），士庶黑白，前往观听之人极多。有时名僧讲经，更是从皇帝到百姓，争相前往，摩肩继踵，甚至道路为之拥塞。讲经之时，一些有才华的僧人，还常伴以演奏佛乐，更引得“士女观听，掷钱如雨”，“听者填咽寺舍”，有时连演奏都未曾开始，狂热的观众抛掷钱财什物，已经淹没台上座位。

尤其在隋唐约近 400 年间，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佛教，已全面成熟，社会普遍信仰。又随着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僧的活动，在文学、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传播手段也日益多样化，真正走向民族化乃至民俗化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。虽然五代以后，佛教从整体上呈衰微态势，但从另一个特定层面看，它已经深深渗透进民俗之中。

西方有些思想家（如马克斯·韦伯）曾指出，应该区分“专家的宗教”和“通俗的宗教”。国内也有些学者（如何光沪）认为，专家宗教与大众宗教之间，差距是很大的；同一文化形态的高低层次之间的距离，往往比并立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距离还大得多，比如作为基督教徒的汤因比和作为佛教徒的池田大作，就能够进行融洽深刻的对话，而牛顿与一位乡下老太太，恐怕就无法交流对于同一宗教的理解了。

我觉得这种区别（或曰差距），在中国宗教文化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由历代具有文化人（而且是层次颇高的文化人）特征的名僧创造的中国佛教文化，准确地讲，就是一种“专家宗教”，它与中国固有文化，相互交融，尤其是汉地佛教文化，宋明以后，与儒教伦理纲常密切联系，总的趋势是理性化、哲理化，其宗教神学的色彩，实际上十分淡薄。然而，就佛教文化的现实存在来看，构成中国佛教的广大而深厚的基础的，却是普遍的民间信仰氛围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对于佛教神灵菩萨的纯粹功利性、实用性的祈求和希冀，以及

对于这种祈求和希冀的有效性的强烈向往、热诚虔信。比如，在经受了今世痛苦磨难之后，对死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；在目睹现实生活的变幻多端之后，对与之息息相关的福、禄、寿、财等利益的渴求；并通过烧香、念经、许愿、布施、拜佛、法事之类途径，来换得心理的抚慰与满足。这就是“通俗的宗教”或者“大众宗教”。但正是这种宗教“文化”，在使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西方净土等等形象深入人心、妇孺皆知的同时，佛教也家喻户晓和真正扎根。

从“专家的”宗教文化，向“大众的”宗教文化的完成，大而略之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心理建构上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，在于她不仅自身具有成熟的文明传统，而且能够充分吸收、消化、容摄、改造外来思想。从哲学思维方式看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，虽有矛盾，但也颇具相通互补之处。如儒家主张现实人生的积极主动，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刚健有为，对“死”之类的人生终极问题兴趣不大，孔子就基本不谈此类理论；而佛学一整套关于生与死的系统论述，正好与之互补。又如道家讲论，玄而又玄，但老庄思辨哲学，恰与佛教空有理论相通。再如宋明理学，既对佛教有所批判，但又有所吸收融合，佛教人生理论中，将主体修心与宇宙本体相统一的思想方式，就对理学有明显影响，从而使中国哲学能建立起一个更为完善的本体论、价值论和人生哲学体系。

佛教传入之前，中国文化的厌世思想，总的来说比较单一，也比较消极，老子的“骑牛出关”，庄子的“鹏飞九天”，都只是一种纯粹的遁世；孔子的“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”，则只能看作是更为肤浅的失意时的自我安慰。而佛教则以出世和彻底解脱苦难为标榜，具有直接否定现实不合理的意义，因此使汉民族心理建构产生了剧

烈冲击和重新组合,于是能产生彻底否定现实世界,大胆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气质,开阔了中国文化襟怀。

这些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佛教所蕴含的宿命、保守、虔信、惰性,对汉民族的内向、封闭的性格心理也有所强化,这种强化,伴随整个封建文化的保守封闭而走向极限,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侵蚀,也极为严重。

二是在文学、艺术、语言等文化传播方面,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。

宗教文化往往是培育人类艺术的玻璃暖房,这在东西方都一样。中国佛教与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,更表现得充分而具神奇意味。当佛教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散播并弥漫之后,这种以出世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氛围,激发了人们关于彼岸世界以及如何到达彼岸世界的全新艺术想象,比如在艺术素材上,出现了一反传统,而将高高在上的神圣天国,结合到世俗人生的审美理想之中,化为比常人高大几十倍、但分明又带着常人原型的石刻佛像,这在敦煌、云冈、龙门等地随处可见。

当人们面对龙门石窟那尊举世闻名的卢舍那佛,谁能不感受到心灵的震撼?那令人一看之后永世难忘的微笑,绝非“魅力”二字所能形容。那样地宁静愉悦、慈祥仁爱、淡然潇洒、超脱怡然,分明是对世界图象的一种昭示。但它是对人生苦难的同情,是对滚滚红尘的看破,是对沧海桑田的理解,是对兴亡闹剧的蔑视?却说不清,道不明,唯令人浮想联翩……

随着时间推移,佛和菩萨都纷纷从云端莲座、高山大野、雕栏画栋、帝王宫室走下,降落民间千家万户。宋元之后,市井勾栏、草茅瓦舍之间,已到处有观音、罗汉……一些著名题材,从“目莲救母”到“唐僧取经”,都自成格局,广泛流布。

佛经翻译,使中国翻译文学得以形成。佛教的意境及伴随佛教而来的印度声明,大大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前进、律体诗的完善和